



湖南文艺出版社
周楞伽著
《哪吒》

神话传奇的书页新章与银幕回响

□张无极

在神话故事的浩瀚星河中,哪吒的形象熠熠生辉,以独特魅力跨越时空,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英雄典范。周楞伽所著长篇神话小说《哪吒》,在2025年迎来时隔40年的首次完整再版,它不仅续写了哪吒的传奇,更与那些深入人心的哪吒电影形成有趣呼应,共同构建起一个丰富多元的哪吒文化世界。

周楞伽(1911—1992),这位现代作家与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凭借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神话故事的独特理解,在《哪吒》中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他以《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经典神魔小说为蓝本,却不拘泥于原著,大胆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用风趣幽默又不失古朴韵味的文笔,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波澜壮阔的神话世界。小说讲述了哪吒从出生到成长为英雄的传奇历程,塑造出一个智勇双全、正直善良、嫉恶如仇的少年英雄形象,书中既有哪吒闹海、剔骨还父、化身莲花等经典情节,又融入了石矶娘娘、魔家四将、杨戬、孙悟空等众多神话人物,构建出一个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故事网络。

书中的哪吒形象立体鲜活,充满人性的温度。他在面对邪恶时,展现出超乎常人的勇敢与果断。在“哪吒三打龙王”情节里,龙王的儿子敖丙仗势欺人,危害百姓,哪吒得知后义愤填膺,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他手持乾坤圈、脚踏风火轮,与敖丙展开激烈搏斗,凭借机智勇敢战胜对手。这不仅展现了他高强的武艺,更凸显出他为民除害的正义之心。在面对亲情的困境时,哪吒也有纠结与痛苦。父亲李靖受封建礼教束缚,在龙王的威逼下,对哪吒误解颇深,甚至逼他剔骨还父。哪吒虽满心委屈,但对父母仍有眷恋之情,这种亲情的拉扯使他的形象更加真实可感,让读者看到一个有血有肉、在成长中不断挣扎的少年英雄。

哪吒的故事被多次搬上银幕,其中影响深远的当属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哪吒闹海》,2019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以及2025年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对比小说原著与电影,能发现它们在角色塑造上既有相似之处,又各具特色。相同的是,都突出了哪吒勇敢正义的核心品质。无论是原著中对抗龙王,还是电影里守护陈塘关,哪吒始终站在正义一方,为了保护百姓不惜与强大的邪恶势力战斗。不同的是,电影会因应时代需求和观众喜好,对角色进行有针对性的塑造。比如,《哪吒之魔童降世》着重刻画哪吒的孤独与叛逆,通过展现他渴望被父母和村民认可的心理,强化角色的情感冲突,让观众更易产生共情。而原著则在神话故事的宏大背景下,全方位展现哪吒的成长历程,细致描绘他在面对不同人际关系和复杂情境时的心理变化,使角色更加丰满立体。

从文化内涵来看,哪吒的故事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正义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哪吒所代表的正义,是对公平、公正的执着追求,他的行为激励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勇敢面对不公,为正义发声。人性的复杂在故事也有深刻体现,以哪吒与李靖的关系为例,李靖起初受封建观念影响,对哪吒的行为不理解、不支持,反映出人性在面对权威、道德和亲情时的挣扎。哪吒的成长历程则象征着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他在磨难中学会坚强、勇敢和担当,传达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即无论遭遇多少困难,只要坚守信念,就能实现自我成长。

在当代社会,哪吒的故事具有重要价值。从文化传承角度,它作为中国传统神话的经典代表,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不同艺术形式的传播,能增强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教育意义方面,哪吒身上的勇敢、正义、坚韧等品质,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塑造和人格培养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同时,哪吒故事的不断创新演绎,为文化产业提供了丰富素材,电影、动画、游戏等领域纷纷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推动了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艺术的有机结合。

周楞伽的《哪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哪吒故事的文学视角,它与电影版本相互补充、相互映照,共同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哪吒文化世界。无论是书中的精彩情节,还是电影里的创新演绎,都让哪吒这一神话形象在不同时代焕发出独特魅力。在未来,相信哪吒的故事还会继续以不同形式流传下去,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激励人们追求美好品质的永恒经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德]柯丽莎著 金毅译
《铁路与中国转型》

速度与制度

□陆远

2024年岁末,北京国家铁道试验中心环形试验轨道上,两列CR450动车组列车首次亮相,试验时速450公里,运营时速400公里,将成为全球最快的高铁列车。高铁时代的乘客早已习惯于“千里京沪一日还”的“中国速度”,对这样的成就也许不以为意。而事实上,从时速350公里到400公里,绝非简单的技术升级,举凡顶层指标设定、核心技术攻关、关键图纸绘制,对中国铁路来说,都是从零开始的创举。德国历史学家柯丽莎则从另一个角度深化了我们对中国高铁发展里程碑意义的理解。在代表作《铁路与中国转型》中,柯丽莎告诉读者,直到20世纪初,在全世界各主要国家中,中国铁路发展水平还是最低的。1912年,贯通南北的津浦铁路开通,即便乘坐这趟中国当时最快的列车,从天津到上海至少也要花上三天两夜。不仅如此,这条举国瞩目的铁路,从勘探、施工、通车到投资、运营、管理,基本由英德两国政府、财团和技术专家一手包办,是地道的舶来品。然而仅仅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人已经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将中国高速铁路打造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奇迹的背后,是20世纪中国社会曲折而坚定的现代转型。

柯丽莎是著名的中国商业史学者。幼时她就对铁路和火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科期间,作为复旦大学的交换生,她也曾多次乘坐火车在中国游历。为研究中国铁路在过去120年里的发展轨迹并进而考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巨大转型,柯丽莎穷十余年之力,搜集了大量中、英、德文档案、报纸、私人日记、通信、文学作品、广告等,还曾于2005年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一整年的实地调研,走访原铁道部机关、铁路局机构、铁路大院、车站、铁路博物馆等,访谈了相当数量的老铁路工程师和一线铁路工人。《铁路与中国转型》不仅是一本严谨扎实的铁路史著作,更是一种具体而微又引人入胜的中国现代化历史叙事。

铁路对中国发展意味着什么?最直观的感受当然是速度的提升。直到20世纪80年代,南京游客去杭州,坐火车还要辗转六七个小时。而今天长三角主要城市,都因为铁路提速和路网发达形成“90分钟都市圈”,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速度提升带来的,是物流效率的大幅提升、生活半径的急剧扩展、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乃至价值观念的根本变化——伴随自由而高效的流动而来的,一定是视野、眼界和认知上的改观。

相比之下,铁路对一个国家制度构建和文化塑造的总体性影响,尽管并不像“速度”那么显而易见,却如静水深流,深刻改变着社会变迁的底层逻辑,这正是柯丽莎教授在本书中着力阐释的主题。

从个体日常生活的微观角度看,铁路“引入了一种新式的时间纪律”,这既是铁路提升运营和管理水平的必然结果,也对国民素质的提升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而言,“守时”不仅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品质,更是协调社会整体行动的基本前提。很难想象,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如果没有统一的时间度量,跨区域的工作生活该如何对接。在个人计时工具还不普及的时代,车站的大钟与列车时刻表,往往是那些偏远地区最重要的校时工具。更加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49年10月,第一次出现了“北京时间”的概念,随后两三个月内,除了零星的偏远地区,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使用北京时间作为统一的标准,正是铁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传播者”的角色。

在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层面,铁路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柯丽莎指出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铁路发展缓慢,主要倒不是因为国人的守旧排外,而是中国缺乏现代技术扎根的总体环境。更何况列强瓜分势力范围,军阀各据山头,都是中国铁路稳定发展的阻碍。早在1921年,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就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铁路建设计划,意图将铁路延伸到中国各地,甚至越出国境。直到1949年以后,通过一代代铁路人的共同努力,这一夙愿才得以初步达成。从某种意义上讲,铁路可以作为现代中国历史延续性的一个重要标志物,通过铁路来“推动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百余年来一直都是重要的国家议程。

柯丽莎说,中国铁路发展的历史,是“中国故事”,也是“全球故事”,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这个全球故事的主题是中国如何在半殖民状况下勉力构建自己独立的铁路系统,那么在21世纪,这个故事的主旋律将是高铁路网如何为“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我在



上海译文出版社
[爱尔兰]科尔姆·托宾著 张芸译
《王尔德、叶芝、乔伊斯与他们的父亲》

文学大师们的父亲

□思郁

文学中的父亲大多时候都是一副隐约的背景,当父亲成为一种文学原型之后,又变成了主要的打击目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入了“父子对抗”的概念之后,文学写作就变成了一条清晰的扞伐之旅,他们要么反抗父亲,要么将父权制具体化,在对抗父亲的路途上越走越远。但是读书越多,我们也开始明白,这在很多时候只是口号,并非现实。每个父亲的相貌都各不相同。

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大概感受到了文学与现实父子关系的复杂,才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了都柏林这个城市中存在过的几位文学大师的父亲,他写了本书叫《王尔德、叶芝、乔伊斯与他们的父亲》,三篇文章,每一篇写一个人,这本书原名叫《狂人、恶徒与危险分子》,对应了三种不同的父子关系。我们都知道都柏林这个小而精的城市在二十世纪涌现出了多位文学大师,奥斯卡·王尔德、诗人叶芝、詹姆斯·乔伊斯,还有塞缪尔·贝克特,包括作者本人托宾,都是这个城市的文学形象代言人。但是少有人将他们的父亲作为主角进行打量 and 审视。托宾有这个想法主要源于这几位文学大师的家庭之间似乎有种神秘的关联,比如叶芝的父亲和王尔德的双亲属于同一个社交圈,而乔伊斯的父亲大概也在街上遇到过王尔德的父母,他们曾在同一条街上居住过。而叶芝在不同的时期曾经资助过落魄的王尔德,声援过乔伊斯。

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托宾也意识到,虽然他们分属不同的阶层,但他们都有三个失败的父亲,“他们的父亲也都独立于世,不遵循任何团体制定的路线行事。他们过着仿佛没有向导,没有地图的人生”“这三位父亲,他们个个制造混乱,他们的儿子却做出了成绩”。他们也都见证了自己的失败和儿子的成功,这种复杂父子关系的呈现就有了多个层次感,这才是托宾最感兴趣的地方。

三位父亲中,王尔德的父亲是最才华横溢的。他是一代名医,还是一位重要的古文物研究者、地志学者、民俗收藏家和考古学家等,他有很多代表作,他是社交达人,他们家的文艺沙龙享有盛誉。但是他的后半生差点因为一桩丑闻身败名裂,陷入一桩强奸少女的丑闻当中,最后赔偿了不少损失。等他晚年去世的时候,家中的多数财产挥霍殆尽,仅仅留给王尔德一百英镑。考虑到王尔德后半生入狱的经历,他似乎在重复父亲的冒险,而且选择了更加极端的方式。

而叶芝的父亲是一名失败的画家。他就像那种非常独立、没有感情的落魄艺术家一样,喜欢将自己所有的激情都献身于艺术创作。他结了婚,生了四个孩子,但是从来没有对家庭和孩子产生很大的责任感。他不会抚养孩子,不会理财,不会照顾家庭。他一辈子都乐意承认的身份就是一个画家,他投身于绘画创作,但是却没有一幅完成的作品。他大半生都在家庭之外,远在他乡,他就像那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开始依靠妻子,然后依靠成功的孩子支持,晚年还陷入到一段激情当中,七八十岁还渴望一段非常热烈的爱情。

这篇写叶芝父亲的篇章是我最喜欢的一章,“在这位父亲的财务状况越来越糟糕之际,他的四个孩子人人工作挣钱。他们自小就做事认真,有决心又勤勉”。他的每个孩子都很成功,他自己的人生却一事无成。这种奇妙的父子关系,大概是很多文学中很少写到的。没有人在乎他的影响力,伴随着孩子巨大的事业上的成功,他愈发感到了一种挫败感。

在写乔伊斯父亲的那篇文章中,托宾说詹姆斯·乔伊斯让他的父亲在都柏林过着听天由命的生活,在父亲缺席的情况下,他不仅试图打造他血统里未生成的良心,还设法理解他父亲的经历,让其获得重生,使已成幻影的东西变得真切实在。

乔伊斯的父亲出生于富商之家,但大部分时间里都做着一个小微的收税员的工作,收入微薄。乔伊斯与他的父亲并不亲近,他大部分时间都距离家庭很远,人在巴黎,靠想象着父亲来生活。他的写作也弥补了这一点。乔伊斯在书中描述的父亲的形象比现实中更加完美。要知道,这就是文学的悖论,当我们远离父亲的时候,似乎更容易接近他。当我们接近他的时候,只会感觉到深深的失望。

托宾在这本书中描述了三位文学大师的父亲。与其说他们都有一个失败的父亲,倒不如说他们的父亲提醒了他们不要重蹈覆辙,过失败的人生。

远见近拾